

多管齐下、联手防控,挤压恐怖主义生存空间

恐袭新挑战呼唤国际合作新思路

新华社记者 何奕萍 邵杰

2017年元旦,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遭遇恐袭,在新年伊始为全球反恐形势敲响警钟。结合新年前后乃至近年来中东和欧美多地发生的恐袭事件,恐怖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新形式,新的挑战也使得开展多管齐下、联手防控的多边国际合作的呼声越来越清晰。

近年来,各国政府加强了防恐、反恐措施,致使恐怖分子运作类似“9·11”事件那样的恐袭活动难度加大,但现实是近年来的恐袭

频率仍不降反升。尤为明显的是,2016年10月以来,尽管在伊拉克、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取得积极进展,但战场上的胜利并未实质性舒缓反恐形势的严峻。

究其原因可以发现,恐怖分子在行动方式和操作模式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点状分散的“独狼式”袭击越来越多,恐袭方式更加多变。2016年12月19日,土耳其和德国接连发生恐袭事件;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在安卡拉遭一名枪手枪杀,柏林一处市场遭一辆卡车蓄意冲撞。在这两起恐袭事件中,袭击者均为单独作案,且袭击方

式都不是过去惯常使用的自杀式爆炸袭击。

另一方面,恐怖分子身份构成越来越复杂,流动性越来越强,袭击目标越来越多样。伴随社交媒体的兴起和通信联络技术多样化的的发展,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招募成员、宣传极端思想、指挥行动愈发简单且隐蔽,致使传统的反恐手段在布网和监控层面都遇到新的挑战。

恐怖主义的产生,既有经济发展滞后和极端思想乘虚而入等原因,也有外部势力推波助澜等因素。消除恐怖主义,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但就恐怖主义新近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国际社会对务实推进反恐合

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只有多管齐下、联手防控,才能有效打击恐怖势力的扩散蔓延,挤压恐怖主义生存空间。

分析人士和反恐专家指出,以中东和欧洲的反恐形势看,现阶段,联手防控可从五个管道入手,归纳为控人、控枪、控钱、控网和控声。

控人,即监控涉恐嫌疑人,围绕近期中东和欧洲发生的恐袭事件进行分析,袭击者既有本地人,也有外来人员,传统的本国监控模式存在明显“盲区”,只有加强国际合作,理顺信息情报交流渠道,才能及时有效监控流动中的涉恐嫌疑人。

控枪,就是防止各类武器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中。在这一层面,须与武器走私、武器交易、武器泛滥的源头地区加强反恐合作,同时监控武器的流动脉络和人员的流动脉络。

控钱,即掌握、切断恐怖分子间资金流动。伴随社交媒体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恐怖组织间及恐怖分子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越来越隐蔽便捷,如何推动互联网企业、互联网金融运营商参与反恐是新的课题。

控网,就是要对各种通讯网络进行监控,既要阻隔恐怖分子间的联络往来,又要防止恐怖分子借助社交网络等新媒体方式传播极端思想和招募新成员。

控声,就是要控制对恐袭事件的过度渲染,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应当避免被恐怖分子利用,避免为恐怖分子造势,避免加剧民众恐慌,避免给反恐“帮倒忙”。

全球反恐形势错综复杂,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根除恐怖主义,只有打造多渠道的务实合作,构建全方位的国际反恐网络,才能使恐怖思想无处可播,恐怖分子无处可逃,恐怖主义无处遁形。(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共和党控制的

美新一届国会履职

新华社华盛顿1月3日电(记者刘阳 徐剑梅)美国第115届国会3日履职,参议院和众议院都由共和党把控,或将对奥巴马政策多项政策进行调整。

共和党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据52席,在众议院435席中占据241席,继续保持上一届国会以来在参众两院的优势地位。

在参议院中,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担任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担任少数党领袖。在众议院中,共和党人保罗·瑞安当选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的南希·佩洛西为少数党领袖。

新一届国会中共有52名新人,其中有27名共和党人和25名民主党人。众议院迎来了第一位印度裔女性议员。在参议院,女性人数迎来新高,且第一次有拉丁裔女性参议员。

根据美国库克政治报告网的分析,在本届国会中民主党的组成较共和党更为多元化。有87%的共和党议员为白人男性,而民主党众议员中这一比例为41%。支持民主党的选区大多集中在东西海岸城市化高的地区,而支持共和党的地区则多在中西部和乡村地区。

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对待奥巴马医改法案,即《平价医疗法案》和移民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但两党都支持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参议员一任6年,每个州有两名参议员,众议员一任两年,各州众议员数量根据州人口多少不等,每两年进行国会选举,所有的众议院席位和三分之一的参议院席位参加改选,议员没有连任限制。

在上一届国会中,共和党在众议院占据247席,在参议院占据54席。

仍难明朗的韩国政局

毕振山

1月3日下午,韩国宪法法院就总统弹劾案举行了首场辩论,此前被停职的朴槿惠没有出席。总统弹劾案结局未定,大选日期未定,潘基文以及各热门总统候选人前景未定,韩国政局仍然扑朔迷离。

韩国宪法法院3日正式开始审理总统弹劾案,但由于朴槿惠没有出席,首场辩论仅持续了9分钟便告结束。1月5日和10日,宪法法院还将就弹劾案举行第二和第三场辩论,外界普遍预测,届时朴槿惠很有可能继续缺席,而由她的代理人因为她进行辩护。

尽管在韩国国民和在野党的压力下,宪法法院已经表态将加快审理弹劾案,朴槿惠却不愿就此认输。1月1日,朴槿惠被弹劾后首次与记者见面,否认催促实干政的指控。朴槿惠的试图翻盘,很可能使宪法法院难以在短期内作出裁决,这将直接影响到今年总统选举的时间表。

不过,选举时间未定并没有影响到各热门候选人的参选热情。本月3日,刚刚卸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对外透露,他将于1月12日下午回到韩国,并同全体国民发表10年联合国工作的感想。他还表示,将在首尔倾听民意后,在适当时期作出决定。

在分析人士看来,潘基文参选总统的

最大变数是他将以何种方式参选。第一种方式是加盟保守党派,这包括执政党新国家党以及刚刚从新国家党内分裂出来的“改革保守新党”;第二种是加盟在野的左翼或偏左党派,如偏左的国民之党近日就频频向潘基文示好;第三种方式是加盟其他小党派或自立党派,潘基文2日曾表示支持一项有利于小党派的国会选举制度改革提议,这被认为他有可能作为小党候选人参加选举。

除了潘基文,被韩国媒体列为热门总统候选人的还有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属于共同民主党的城南市长李在明、国民党前联合党首安哲秀和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在这5人中,只有文在寅和安哲秀已经宣布参选,其他人尚未明确态度。而最新民调显示,目前文在寅的支持率最高,潘基文其次,李在明第三,安哲秀和安熙正并列第四。

虽然文在寅和潘基文在民调中具有较大优势,但有分析称,鉴于最终选举日期尚未确定,韩国朝野各党又处在快速分化重组过程中,上述5人的参选前景并不明朗。

文在寅有较明显的“亲卢(武铉)”倾向,潘基文国内从政经验不足,李在明的激进言论也容易引起争议。另外,党派重组催生出新的“黑马”也不是没有可能。

国际时评



梁凡

当地时间1月3日,英国驻欧盟大使伊万·罗杰斯宣布辞职。在英国政府几个月后即将启动脱欧程序的关键时刻,拥有丰富对欧谈判经验的罗杰斯的突然离去,令英国脱欧之路再次蒙上不确定性的阴影。

虽然罗杰斯并未公布辞职原因,但在BBC披露的他给同事的邮件中,罗杰斯写道,他对脱欧进程中潜在危险所作的警告令英国政府不耐烦,这让他感到沮丧。

罗杰斯在信中称,他的任期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他认为,在英国与欧盟的谈判中,从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到谈判完成为止,最高级别的团队最好能够保持一致。因此,在今年晚些

时候再更换大使人选是“说不通的”,他因而决定现在辞职,以使得政府可以及早确定继任人选。

在罗杰斯宣布辞职后,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罗杰斯选择在此时辞职,是为了让政府能够在正式启动脱欧程序前找到继任者。英

国政府对他过去3年的工作表示感谢。

英国媒体上月曾报道说,罗杰斯私下表示,英国与欧盟的谈判有可能长达10年,即

驻欧盟大使突然辞职

英国脱欧谈判再添“难度”

使协议最终达成,也需要其他27个成员国的批准,失败的几率很大。多家英国媒体分析认为,由于罗杰斯总是将其他欧洲领导人的意见汇报给国内,其中包括对英国脱欧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观点,这不仅让政府内的脱欧支持者将其视为悲观论者。

在英国即将启动脱欧程序的关键时刻,拥有丰富对欧谈判经验的罗杰斯突然辞职,

在英国国内激起了不小的舆论声浪,消息占据了当天英国各大媒体的头条。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罗杰斯的辞职,对需要谈判专家的英国而言是一个打击。

英国《卫报》的评论文章指出,罗杰斯的辞职意味着英国政府更加倾向于启动一场“硬脱欧”,英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通过协商达成折中方案的希望更加渺茫。

姚明是否担任中国篮协主席和男篮主教练不得而知,但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已然升温——

“这需要有大智慧”

本报记者 袁浩

1月4日,CBA联赛第25轮全面展开,北京农商银行队主场迎战天津队。上半场,天津队大外援泰勒被罚出场,不过,这并没有影响球队最终以124比100大胜农队。一边倒的比赛乏善可陈,而场外消息则热闹得多。

1月2日,《篮球先锋报》率先披露国家体育总局对中国篮球发展作出的10点批示,其中,建议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和中国男篮主教练无疑最具引爆点。一石激起千层浪,“小巨人”将成为中国篮球改革的急先锋?对此,坊间热议不断,利弊分析连篇累牍。不过,截至目前记者发稿时,当事方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篮协和姚明本人均未正面回应。

姚明是否会身兼两职?此事尚难定论,但在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张庆看来,这意味着中国体育改革如离弦之箭,越飞越快。“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2017年,中国体育管理体制必将提速。”

张庆的这一判断基于两个事实,一是在2016年12月28日举行的体育工作座谈会

上,“实现体育体制机制改革新突破”成为共识。另一个是,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新年献词”中表示,“要以问题为导向,抓住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敢于自我革命”。

为何中国体育的管理体制成了“众矢之的”?张庆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的改革精神有关,要做到这一点,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激发社会力量,在体育服务的供给端发力。”

长期以来,传统的体育管理模式为中国体育发展,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业余体校、省市地方队、国家队的三级训练体系也培养了大量奥运冠军。然而,目前这套系统也面临着生源匮乏的问题。此外,从小学到大学,家长越发重视体育锻炼,但校园体育缺乏专业教练,体育与教育系统间的壁垒阻碍了培养体育人才。

此外,自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来,体育的产业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体育产业已与竞技体育、全民健身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作为当前中国体育产业中最大的赛事

IP——中超和CBA联赛——仍然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天价外援和球场乱象不断,而民间办赛也屡次发生意外事件。

在张庆看来,这些问题都逼迫管理方必须自我革新。“一方面体育部门管得太多,削弱了社会团体和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国情所限,中国的职业体育仍然处于培育期,是在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需要协会、市场参与,也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因为很多事情不仅涉及到体育部门,还有住建、税务等相关部门。”

从长远来看,体育部门做好服务,单项协会实体化、主管单项赛事和项目普及推广,职业联赛主导职业联赛,三者各司其职,互相协作将是改革的大方向,这需要“看得见的手”去设计。例如,在率先开展单项协会实体化的中国足协近日被曝出在主席人选和联赛归属上不愿放权,以致成立“中国职业足球联盟”一事一拖再拖。

至于有人担心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会影响中国竞体体育的水平,张庆表示,要一分为二去看待。“在中国,并不是所有运动项目都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一些小众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项目,它们需要国家扶持,举



1月4日,在北京队与天津队的比赛中,天津队大外援泰勒(图左)被罚出场。

本报记者 许之丰 摄

化名为Master的AlphaGo,在网络对弈中连续战胜柯洁等数十位围棋界顶尖高手——

“棋葩”究竟“智”在何处

本报记者 李元浩

1月4日晚间,战胜周睿羊取得第59胜后,神秘的Master宣布自己就是AlphaGo。代替其落子的是其团队的黄士杰博士。在与古力九段下完最后一局棋后,Master最终取得60胜的战绩(其中仅有中国棋手陈耀烨因电脑意外掉线而被系统判为和棋),其手下败将包括14名世界冠军得主。更令人咋舌的是,当今日韩三国围棋界的最强棋手——柯洁、井山裕太和朴廷桓3人,不仅在与Master的对抗中全部落败,甚至在对局中看不到些许取胜机会。

此前,Master是谁一直困扰着大家。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俞斌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几乎没有差错的连续获胜,肯定是人工智能无疑。”有意思的是,2016年12月30日凌晨,推特账号Science News曾发布了一条推文——AlphaGo:“Now, I am the master”。如今,这一猜测得到证实。

据记者了解,除了Master这个风头正劲的人工智能,已得到确认的日本围棋人工智能“DEEPZEN”,中国围棋人工智能“刑天”、“绝艺”、“屠狗”等,都在近来的网络对弈中取得不俗战绩。例如“刑天”在近20盘对局中的战绩为16胜4负,还多次战胜柯洁和朴廷桓等顶尖高手。

一直以来,围棋都被看作是人类在智力

游戏上的最后一个“堡垒”,复杂多变的下法被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认为难以迅速突破。但无论是去年的AlphaGo,还是如今被棋手们称为“棋葩”的Master,除了其比人类超出太多的计算能力外,恰恰是在人类棋手最引以为傲的创造性上更胜一筹。

根据开发商谷歌方面公布的信息,作为一款围棋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是利用“价值网络”去计算局面,用“策略网络”去选择下子,通过多层的人工神经网络和训练,进行精准复杂的处理。作为AlphaGo的升级版,Master的计算和应变能力无疑又会得到质的提升。

“人工智能的计算和认知能力是人类的几万倍,所以它会天然具备很多人类无法比拟的优点。”去年以来组织了多场人工智能围棋研讨的国手李喆认为,“人机大战”给围棋带来了新的理解,开拓了一些新的思路,包括技术层面的剖析以及对围棋知识体系的深度研讨。

从围棋发展的角度来看,即便是人工智能最终压倒人类棋手,也许并非什么“世界末日”。围棋中的人机博弈,不仅仅是人类与机器的关系,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正如柯洁在输给Master后发微博称:“新的风暴即将来袭。人类围棋数千年的实战演练进化,计算机却告诉我们全都是错的。但我想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棋手将结合计算机,迈进全新的领域,达到全新的境界。”

筹建“职业足球联盟” 中国足协展现改革决心

新华社记者 岳东兴 公兵 王子江

原定于2016年年底成立的“中国职业足球联盟”,由于以俱乐部代表为主的筹备组在章程草案的核心原则上,出现分歧和偏差,导致联盟没有如期成立。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3日向记者介绍,如果进展顺利,联盟将在今年2月底或3月成立。

值得肯定的是,在联盟筹建的半年多来,中国足协严格按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指示精神,在现阶段做到了最大限度的放权——其一,中国足协不作为职业联盟的成员进入成立后的职业联盟当中,联盟成员只包括中超、中甲32家俱乐部的代表;其二,联盟主席并非由足协推举,而是由职业俱乐部的投资人推荐选举;其三,联赛运营和市场开发等诸多权利将逐步交由联盟管理,中国足协仅在四大方面对联盟进行监管。

从上述三点看,中国足球的改革已在2017年步入“深水区”,触碰到的是足协和俱乐部的敏感权益。此次筹建联盟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修订章程草案的核心原则上——联赛的所有权归属方面,以及是否由中国足协授权职业联赛开展各项工作。一些俱乐部表示,作为联赛的参赛主体,联赛所有权这个“核心IP资源”,应当归属俱乐部。但是,中国足协拿出了《国际足联章程》指导下《中国足协章程》的明确规定——中国足协作为中国足球运动的管理机构,“是本会管辖的各项赛事、活动所产生的所有权利的最初所有者。”

如果再进一步探讨,无论是早期的甲A联赛,还是如今的中超联赛,联赛的建立、组织和管理者,都是中国足协,联赛的所有权也毫无疑问归中国足协所有。如果一些俱乐部要享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自己所有权的赛事,那只能到中国足协以外的机构中注册,只能成为一个企业联赛,而不再享有“中字头”的联赛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交流中,国际足联管辖的亚

足联以及再下面的中国足协,属于行业对等关系,如果俱乐部想参加亚冠联赛等洲际赛事,也必须接受中国足协的监管,才能成为代表中国足球、中超联赛的俱乐部,才能合法合规参赛。

现阶段的中超、中甲俱乐部,与欧洲大都发展百年的成熟俱乐部相比,在现阶段还不是独立存在的,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俱乐部。他们中,大都没有自己的体育场,没有从足校到梯队健全完整的青训机构,没有属于俱乐部的青训基地,也更没有经历过“先俱乐部、后职业化”的扎根社区、服务球迷的文化